

蔡元培與北大

(1917~1923)

陶英惠

一 前言	丙 避免科系與他校重複
二 北京大學的創立及其初期發展	丁 溝通文理兩科
(1)京師大學堂時代	戊 各學系的歸納聯絡
(2)民國初年的概況	己廢「年級制」採「選科制」
三 蔡元培出長北大經過及其對高等教育的理想	(5)創辦各科研究所
(1)出長北大的經過	(6)實行男女同校
(2)對高等教育的理想	(7)組織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
四 重要的改革措施	五 改革效果的剖視
(1)提高教員素質	(1)對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2)糾正學生陋習與錯誤觀念	(2)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3)培養自由研究學風	(3)與五四愛國運動的關係
(4)革新學校行政組織	(4)與國民革命運動的關係
甲 改革預科	六 辭職及其原因分析
乙 「學」與「術」分校	七 結論

一 前言

鴉片戰爭後，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動，文化呈現了失調現象，清廷在對外力的壓迫窮於應付下，漸漸產生了兩種覺悟：第一，外交重任，不能再假手無學而重利的所謂「通事」，急應培養翻譯人才；第二，震於西人船堅砲利，急應培養製造船械和海陸軍人才。所以，清末在對於新教育的設施，就從這兩方面入手。^①

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三十多年間，清政府在各

※本文之完成，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六十二學年度之補助及六十四學年度之獎助，特此誌謝。

① 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見莊俞、賀聖浦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海，商務，民國二十年九月出版），上卷，頁 54。

地所設立的新式學校不外三類：（一）外國語文學校。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湖北自強學堂等。（二）實業學校。如：福建船政學堂，上海機器學堂，天津、上海電報學堂，湖北礦業學堂、工程學堂等。（三）海陸軍學校。如：天津、廣東水師學堂，天津、湖北武備學堂，廣東、南京陸師學堂等。^②這些學校，完全是基於當時外交、軍事失敗以來政治上的需要而創設，雖然可以說是我國新式教育的見端，但既無系統與計劃，更談不到專門的教育，所以成績極其有限，至甲午一役，其缺點便完全暴露出來。

甲午戰後，國人自夢中驚醒，一時維新圖強之呼聲高唱入雲，有識之士，恍然於從前模仿西法之不得其本，漸知要與外國爭強，不僅在槍炮和戰艦的設備，更不僅在外國語文的粗通，而在於學貫中西人才的培養。沒有新的教育，國家實難以圖存。於是，推廣學堂、創辦新式學堂，就成為一時的風氣。盛宣懷的創辦天津西學學堂（一八九五）、上海南洋公學（一八九七）、以及李端棻的奏請推廣學校（一八九六），乃為中國的新教育別開了一個生面，從此轉入了比較有系統的新教育時代。

際此新潮流中，我國由國家建立的第一個近代式的大學——京師大學堂，便在歷經波折中宣告成立（一八九八）。及至民國成立，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其間制度之沿革，人才之散聚，在在與我國教育、學術有關。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承受當時朝野企望維新圖強潮流的產物，亦即外應帝國主義之壓迫，內值新舊思想之衝突。因此，他最大的任務，是要把中西學術鎔合於一爐，以革新國家和社會。不幸創立之初，先天條件即不充實，學生大多是為求升遷的小京官，並沒有誠心、決心、信心和虛心去學習世界新知識。民國成立後，以通曉中西文化的嚴復主持校政，也沒有能轉移風氣，來擔負起上述使命。直到民國五年底蔡元培入長北大，推行了一連串重大而新穎的改革，才使其正式成為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替中國教育學術界開啟一個新的紀元，使一所舊學府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源頭，並帶動了政治的改革，在轉移風氣和啟迪民智上，發揮了重大的功效。

②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臺北，正中，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出版），頁 277~279。

儘管蔡元培出長北大的時間並不算久，但他對高等教育的理想和措施，却一直為其以後的繼任者所奉行。筆者希望在本文內，將這些重要事蹟加以研討。

二 北京大學的創立及其初期發展

(1) 京師大學堂時代

京師大學堂係就京師官書局推廣而來，官書局的前身則是京師強學會。

京師大學堂的正式議設，係始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五月初二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推廣學校以勵人才」摺。^③在該摺中，他主張於京師建立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並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歷。這種府州縣學、省學、和京師大學等小、中、大三等學堂並設的主張，是我國學校系統最初的提議。七月十三日，總署議覆，奉旨依議。謂：

「該侍郎所請於京師建立大學堂，係為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④

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隨卽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六項。但事屬創舉，既無成例可循，又不能草率從事；而頑固權臣，復因循推諉，暗中阻撓，故雖疊奉明詔，仍遷延未辦。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鵬運亦疏請興學。直至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定國是」詔中，再度嚴諭：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⑤

這是創設大學的一件重要文獻。五月八日，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卽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八十餘條，十五日，奉諭准照所議辦理。卽將官書局及新辦之譯書局併歸管理，派工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臣，余誠格為總辦，許景澄為總教習，美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為西總教習，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以景山

^③ 相傳此摺係梁啟超代擬。國立北京大學志編纂處編：「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北平，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頁一云：「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疏請立大學於京師，御史王鵬運亦疏請興學。端棻疏尤明切有識見，說者謂稿出啟超手也。」

^④ 總署「議覆李侍郎推廣學校摺」，「時務報」第七冊，頁 7。

^⑤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418，頁 15。

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爲大學基址。醞釀多年的京師大學堂至此始正式定議。不意八月六日，政變發生，新政悉被推翻，大學堂因萌芽較早，得不廢，但遲至十二月十七日，始草率開學。^⑥當時學生分三種：凡進士、舉人出身之七品以上京官，稱仕學院學生。凡進士及舉、貢、生、監官不及七品，或未登仕版，而年在二十以上者，通稱學生，無專繫之名。年不滿二十，則稱小學生。

二十六年春，改派許景澄爲管學大臣。會拳亂作，景澄以極諫遭冤殺，師生紛散，校舍封閉，藏書損失殆盡，大學因是停辦二年。二十七年冬，詔復興大學，令同文館併歸辦理。派張百熙爲管學大臣，吳汝綸爲總教習。二十八年正月，籌定辦法，先設立預備、速成二科，預備科別分政、藝二科，速成科別分仕學、師範二館，至所併同文館學生，則爲設英、俄、法、德、日五國語言文字專科。時宗室、覺羅、八旗官學改爲中小學堂，亦附入辦理。七月十二日，張百熙奏進學堂章程，即所謂欽定學堂章程。九月，出示招考，先開辦速成科，計錄取仕學館學生五十七名，師範館學生七十九名，於十一月十八日（西曆十二月十七日）重新開學。二十九年春，命滿大臣榮慶同爲管學大臣，隱爲監督。更增辦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十一月，頒行奏定學堂章程，管學大臣改爲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另設大學堂總監督，專辦大學，受學務大臣節制。凡譯學館、宗室、覺羅、八旗、中小學堂、進士館、醫學館等皆直隸於學務大臣，不再隸屬京師大學堂。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學大臣印，爲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印章，至是大學始成獨立機關。二月，仕學館併入進士館。三十一年，改學務處爲學部。宣統元年三月，改預備科爲高等學堂。五月，籌辦分科大學，設經、文、法、政、醫、格致、農、工、商等八科，並委任各科監督。次年正月，舉行分科大學開學典禮，僅醫科未能開辦。三年九月，京師譯學館復歸併於京師大學堂內。民國元年三月，改學部爲教育部，任蔡元培爲

⑥ 關於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日期，參閱鄒樹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胡適：「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日期」（「民主潮」第十一卷，第一期，民國五十年一月一日出版）、莊吉發：「京師大學堂」（臺大文史叢刊之三十三，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出版），頁 19~22。「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頁 12 云：「以其年〔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學，是爲本校成立紀念日。原是陰曆，後更正朔，遂用陽曆此日，以求捷便。切實推之，當是次年一月二十八日也。」

教育總長，嚴復爲大學堂總監督。五月，命改大學堂爲北京大學，嗣冠以「國立」二字，京師大學堂名稱從此取消。^⑦

從上述京師大學堂的歷史看來，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自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爲艱難締造時期。大學堂雖在戊戌政變後勉強開辦，但各省學堂並未普遍設立，以作其基礎；設大學而不設中小學，則如無源之水。^⑧此時學生固未足額，規制亦欠詳備，不過略存體制而已。自光緒二十七年至民國元年，爲整頓開拓時期。大學堂在拳亂後，以新的面目出現，釐訂章程，擴建校舍，其規模制度方日臻完善。^⑨

京師大學堂的設立，在我國係屬創舉，其一切措施，多含有因時制宜及試辦性質，故前後之組織及演變，相當複雜，可以說是清季新教育的縮影。

由初期學生的出身及素質來看，很清楚地顯示出，大學堂是爲官吏而開辦的學校，目的在增進國家政治領導階級的品質。這些學生在傳統的國學方面，已有了相當的造詣，然後再在大學堂中使學習西學。^⑩我國自同治元年開辦同文館以來，辦學的好像只知道研究西文，而不知道研究西學，同時又忽略了中學。至是始覺悟到中西應該並重，而且西文只是一種西學的發凡，不是西學的究竟。這兩種覺悟，實是我國大學教育史上一個絕大的進步。^⑪在課程方面，不僅研讀西學的政治、格致、算學等，也注意到農、商、醫等學的實際應用，導致了以後各分科大學的設立，而師範館之開辦，意在培養師資，使教育能普及全國，立意更屬良美。

就教育行政言：大學堂成立之初，不僅爲培養人才的最高學府，同時也是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管學大臣不僅要經理大學堂本身的事務，也要經理全國一切學堂事宜。他的地位，好像是以大學校長兼任教育部部長。這種學校與教育行政合

⑦ 以上參考陳鐘凡：「沿革一覽」（「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民國七年四月出版）、何基鴻：「國立北京大學沿革述略」（「國立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刊」，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出版）、「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莊吉發：「京師大學堂」，頁9—58。

⑧ 范源廉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見「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7。

⑨ 莊吉發：「京師大學堂」，頁142。

⑩ Douglas Gordon Spelman, *Ts'ai Yuan-p'ei, 1868-1923.* PP. 161-162. Unpub. diss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⑪ 同註①，頁37—74。

而爲一的情形，在各省學堂尚未普遍設立前，自然沒有問題；及各省普設學堂，便非管學大臣一人所能兼顧，所以才另設學務處，再改爲學部，民國成立，更名爲教育部。

就學校淵源言：大學堂融合了以前的官書局和同文館，而後來很多學校的設立，又是從大學堂這個系統蛻變出來的。如光緒二十九年增辦之醫學實業館，兼辦施醫局，嗣合爲一體，入民國後的醫專和後來北平大學之醫學院，即肇基於此。三十二年就進士館改設京師法政學堂，就是入民國後的法政專門和後來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前身。宣統元年由師範館改變成的優級師範，即入民國後的高等師範以及後來的北平師範大學。^⑫

至於大學堂的貢獻若何？說法不一，龍德 (Renville Lund) 在其博士論文「京師大學堂」(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的結論中，則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他認爲那些學生們對中西功課都有濃厚的興趣，以後在中國各界都曾擔任過重要角色，發生了很大的影響。^⑬茲引用一段曾在大學堂初期讀過書的俞同奎的話爲證：

「當年我們……對於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會上一班風俗習慣的好壞，都喜歡研究討論。……每天功課完畢，南北樓常開辯論會，熱鬧非常。……果然蛟龍終非池中物，後來所謂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以及雲南起義、廣東護憲，都有我們同學參加，且都是重要脚色。極右傾和極左傾人物，無所不有。至於在司法界、教育界、財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樹者，亦有多人。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談，不過他們各有主義，各有政見，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輩人，却也值得稱道。」^⑭

凡此，均足以顯示京師大學堂在當時地位之重要，以及影響民國教育之深遠。

(2) 民國初年的概況

^⑫ 「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頁 3—6。毛子水：「國立北京大學」（其二），見「中華民國大學誌」（臺北，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出版），頁 27。

^⑬ Lund, Renville C.,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Unpub. diss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6. 原文未見，係參考 D. G. Spelman 前述之論文。

^⑭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頁 14。

宣統三年十月，清廷派勞乃宣爲大學堂總監督。十二月，乃宣請假，命劉經繹代。時革命軍聲勢日盛，京師震恐，大學學務實已停頓。^⑯民國元年二月，大學堂監督事務令由嚴復暫行管理。三月，南北統一，南京臨時政府北遷，改學部爲教育部，以蔡元培蟬聯教育總長。元培於四月十五日自滬啓程北上，二十日抵北京，二十四日正式就職。即積極重行組織教育部。^⑰

蔡元培素極注意高等教育，就任伊始，即呈請將大學堂更名爲「北京大學校」，以嚴復（又陵）署理校長，內部組織及職稱，亦多更動，這是北大校史上的重要文件之一，茲錄原呈於下：

「爲薦任大學校校長事：北京大學堂前奉大總統令京師大學堂監督事務由嚴復暫行管理等因，業經該監督聲報接任在案。竊維部務甫經接收，大學法令尚未訂定頒布，北京大學旣經開辦，不得不籌商目前之改革，定爲暫行辦法。查從前北京大學堂職員，有總監督、分科監督、教務提調，各種名目，名稱似欠適當，事權亦覺紛岐。北京大學堂今擬改稱爲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爲大學校校長，總理校務；分科大學監督改稱爲分科大學學長，分掌教務；分科大學教務提調即行裁撤；大學校校長須由教育部於分科大學學長中薦一人任之，庶幾名實相符，事權劃一，學校經費亦得藉以撙節。現已由本部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該學長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其餘學科除經科併入文科外，暫仍其舊。俟大學法令頒布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謹呈。」^⑱

五月三日，經總統袁世凱批准，並任命嚴復爲北京大學首任校長（署理）。^⑲二十四日啓用新刊關防。^⑳

蔡元培於民國元年教育總長任內，對於大學的改革，據其自述云：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

^⑯ 「民國二十三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沿革」，頁 3。

^⑰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 36，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初版），上冊，頁 308～309。

^⑱ 民國元年五月份「政府公報」，呈文，第五號。

^⑲ 同上，命令，第四號。

^⑳ 同上，通告，第二十六號。

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被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²⁰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於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於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²¹

合經文二科為文科，改格致科為理科，設預科，設大學院及大學注重文理兩科等，都是很重要的措施。蔡元培於七月十四日因政見不合而辭職，而大學令到十月二十四日才公布，但其對預科（第四條）、大學院（第六條）及文理兩科（第三條）的主張，均在該大學令中被採納。²²

民國元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大學開學。九月，財政學堂學生併入北大上課。²³十月，因嚴復離京，無法兼顧校務，以章士釗（行嚴）繼，士釗因署浙江教育司長，未能到校，²⁴乃於十月十八日任命馬良（相伯）代理。²⁵馬良於十月二十一日

②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見「蔡元培自述」（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出版）頁9—33。

②1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見同上書，頁35—47。

②2 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八號。

②3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上海，商務，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頁38；41。

②4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七至十二月份（臺北，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出版），頁788，附表。

②5 民國元年十月份「政府公報」，命令，第一七一號。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長沙，商務，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頁221謂民國二年馬良之任北大校長，係「從教育部長蔡子民先生之請也」，誤，此時蔡元培早已辭去教育總長。

就職視事。^㉙不久，即被學生所攻逐。^㉚十二月二十七日，士劍免職；而馬良辭職，改派何燏時（錫侯）署理。^㉛民國二年十一月，燏時辭職，以胡仁源（次珊）署理。時教育總長汪大燮，屢欲併北大於北洋大學，卒未果行。^㉜三年二月，改農科為農業專門學校，離北大而獨立，即後來北平大學農學院。四年十一月，設大學評議會，為商決校政最高機關。五年十二月，仁源辭，任命蔡元培為校長。民國以來之歷任校長，或為署理，或為代理，至是始有正式實任之校長。

截至民國五年底，北大可說是我國惟一之國立大學。^㉝在這段期間，國內的政治固未上軌道，而北京大學，似乎也無若何發展，由其校長更動之頻繁，證明內部也不安定，且為校長問題，時生風潮。據曾任預科學長之徐崇欽云：

「二年春，為校長問題，全校學生宿于教育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視學生之學業荒廢，以師生之感情，竭力勸導，幾至舌敝唇焦，歷八小時之久，而學生等于是相率回校。無何，馬相伯先生辭職。」^㉞

民國二年五月底，北大預科二三年級學生據章要求免行升學考試，引起嚴重風潮；學生以校長何燏時蔑視法律，摧殘教育，且以穢語詈人，軍警盤踞校舍，要求校長辭職，且迫立悔過書，並至教育部請願。何燏時惱羞成怒，獲得教育部次長暫行代理部務之董鴻津支持，以部令開除秦汝翼等八人，風潮更形擴大。六月十六日，教育部又有將全體學生盡行解散之令。參議院以大學為全國觀瞻所繫，斷不宜遽肆摧折，

^㉙ 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

^㉚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民立報」云：「嚴氏去位，馬良繼之，而為學生所攻逐，至今校長之位虛懸，尚未得人。」

^㉛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部分，未刊稿）

^㉜ 同註^㉚。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出版），頁43 謂胡仁源於民國三年一月四日署北大校長。

^㉝ 范源廉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演說，謂吾國公立大學有三：北大、天津之北洋大學、山西之山西大學。山西大學係特就晉省而設，北洋大學初歸北方各省公立，近幾與北大連為一體，故北大為吾國唯一之國立大學。（見「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頁6。）民國九年秋，蔡元培出國前在湖南的第一次講演「何謂文化？」中說：「就全國而言，只有國立北京大學，稍為完備，如山西大學，北洋大學，規模都還很小。尚有外人在中國設立的大學，也是有名無實的居多。」（原刊民國十年二月十四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〇六號，見中華書局編「蔡元培選集」頁156—161，北京，1959年初版）於此也可看出北大的重要性。

^㉞ 徐崇欽：「八年回憶」（「國立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刊」，頁47）。此事可能係指民國二年五月底預科學生要求免試風潮，而將何燏時誤記為馬相伯。

曾提出嚴重質問。^⑫直到胡仁源繼何燏時署理校長後，才漸趨於安定。而北大之真正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大學，隱然為全國文化的領導，則是蔡元培擔任校長以後的事。

三 蔡元培出長北大經過及其對高等教育的理想

(1) 出長北大的經過

民國元年七月，蔡元培辭卸教育總長時，就有人建議聘他為北大校長，並由教育部向袁世凱商量。袁氏以元培既是國民黨員，又力倡革命思想，如再讓他在臥榻之旁培養革新人才，定會使自己政權發生動搖，故堅決拒絕。^⑬民國五年六月，袁死，黎元洪繼任總統，七月十二日，特任范源廉為教育總長（三十日到任），八月四日，命袁希濤為次長（十六日到任）。^⑭在民元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源廉任次長，希濤任普通教育司司長，二人對元培的教育理想有深刻認識；他們認為像北大這樣一所國家最高的學府，需要像蔡元培這樣開明的人士來領導，特拍電報請他返國出任北大校長。^⑮時蔡元培正旅居法國西南部，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煜

^⑫ 參民國元年六月二日、四日、五日、六日、九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日、七月三日、四日、十一等日上海「民立報」之「大學校之風潮」等報導。此次風潮，雖導因於預科學生要求免試，骨子裏仍為校長問題，學生欲嚴復回任校長，教育部不允。如代部長接見學生代表時，即明謂：「此事遠因，我固審悉汝等前次對馬湘伯，今又用之以對何〔燏時〕者，無非有意搗亂，非得嚴懲道返不止也。此事望爾等不必妄想，有我董鴻禕在教育部一日，嚴懲道終日吞吐雲霧〔惠案：指吸鴉片〕，毫無表率全堂資格，安能用為校長？」（六月四日「民立報」）

^⑬ 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十月出版）頁145云：「蔣維喬氏父告訴我道：『當民元時，先生辭去教育總長，我在教部，便提議委先生為北京大學校長，並由教育部向袁世凱商量。當時袁氏極力反對，說：先生既係國民黨員，又力倡革命學說，目前許多反動事件，已多和他有關；如再給他做北京大學校長，大培養起革新人才來，政府定會弄到沒有辦法，使我不安於位了。旁的都可商量；只有此事，是絕對辦不到的。結果只能籌點經費給先生到歐洲去留學。』」傅斯年在「『五四』偶談」一文中說：「猶憶『五四』以後有人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辦學，無異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四日重慶「中央日報」）

^⑭ 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臺北，文海，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影印本）頁60。

^⑮ 關於推薦蔡元培出長北大的說法不一。張星烺編：「泗陽張沛谷居士年譜」（收入張相文「南園叢稿」中）頁27云：「秋，新內閣成立，范源廉為教育部總長，袁希濤（觀瀾）為次長，北京大學校長鬱人，范、袁等商求一適當人選，先君（張相文）極言蔡子民先生中西兼通為最宜，教部乃電法國請蔡先生回國，主持北大。自是凡十餘年，影響中國學界最大。」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上海，民國三十六年出版）頁62~63謂：最初由馬敘倫向湯爾和建議請元培任北大校長，湯將此意轉告范源廉，時胡仁源剛辭職，范正在物色替人，同意元培為適當人選，乃向黎元洪推薦，因任元培為校長。1956年秋，胡適告訴周策縱說，他曾看過湯爾和的日記，內中留有關於蔡出長北大以及湯與蔡元培、陳獨秀的關係之記載，認為馬敘倫的話靠不住。見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38~139.

瀛（石曾）、汪兆銘（精衛）等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並當選為會長，從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⑥接教育部電後，於十月一日啓程返國，十一月八日抵上海。^⑦

當時他的友好同志，對其出長北大，有兩種意見：一種贊成他北上就職，一種不贊成。孫中山先生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的教育，所以主張他去。^⑧而馬君武則絕對反對。^⑨蔡元培卒毅然前往。據他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文中說：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就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民國六年一月四日到校就職。^⑩

(2) 對高等教育的理想

蔡元培之決心獻身教育，是自光緒二十四年始。戊戌政變發生後，他認為康、梁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人才，所以返里從事教育工作，最先接辦紹興中西學堂，又到上海創辦中國教育會、愛國女學校及愛國學社。民國成立後，他的注意力更集中在高等教育方面。吳敬恒曾說：

「他畢生最致力的是辦大學。他為什麼主張辦大學？彷彿是一個國家，只要有大學問家出來，民族就可以之而貴，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⑪

他欲以教育救國的意願，在接長北大後的「致汪精衛君書」中，表示的非常清楚：

「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

^⑥ 黃世暉記：「蔡子民先生傳略」，見「蔡元培自述」頁49—76。（以下簡稱「口述傳略」）

^⑦ 民國五年十月四日「順天時報」第二版；民國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時報」第七版。

^⑧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見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出版），頁35。

^⑨ 羅家倫：「五四的真精神」，見北大臺灣同學會編：「五四愛國運動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臺北，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四日出版），頁33。

^⑩ 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三五一號；民國六年一月七日「政府公報」，第三五七號。

^⑪ 吳敬恒：「蔡先生的志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重慶「中央日報」。

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崙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主義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羣歸功於小學校教員；所以有此等小學校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⑫

蔡元培是一位中國學問很深，民族意識極強，於中年以後再到歐洲留學多年的人。在他留德期間，對比較著名的大學，如柏林大學、門興大學及來比錫大學，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對大學的觀念，無疑地也深受十九世紀初期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⑬他們主張學術獨立，將大學自由視為金科玉律，教授有充分的講授自由，只要確信為真理，任何人不得干涉；學生有學習的自由，以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對學生的生活，也不強為干涉。^⑭這些特色，都為蔡元培所潛接而默受，成為他辦理北京大學時的借鏡。他希望北京大學能與柏林大學相頌頌、以及力爭世界學術地位的雄心，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他的演說詞中，表示得非常清楚。^⑮

民國七年，北大製定了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點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蔡元培解釋說：「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他又進一步指出：

「世界事物，雖然複雜，總可以用科學說明他們；科學的名目，雖然也很複雜，總可以用三類包舉他們。那三類呢？第一、是現象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等；第二、是發生的科學，如歷史學、生物進化學等等；第三、是系統的科學，如植物、動物、生物學等等。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⑫ 新潮社編：「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北京大學新潮社，民國九年十月初版），頁291。

⑬ 同註⑫，頁56—57。

⑭ 天民：「各國大學之特色」——四、德國大學，見「教育雜誌」第九卷，第十二號（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頁125—132。

⑮ 蔡元培演詞云：「本校二十年之歷史，僅及柏林大學五分之一，來比錫大學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嘗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頌頌耳。」（「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頁5—6。）

又因為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故用總和七色的白色來表示哲學，而玄學是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的，故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玄學。蔡元培又說：

「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⑯

蔡元培一再強調：大學是純粹研究學問的機構，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至於應該研究那些學問，在上面引述他的文字中，已經有了明確的交代。凡此，均充分顯示出他辦理北京大學以及對高等教育的理想。

四 重要的改革措施

民國初年的北京，是頑固勢力和腐敗思想的核心，帝制、復辟運動，此起彼伏，環境至為惡劣。這種風氣之形成，與袁世凱有着莫大的關係。民國五年六月，袁氏憤恚卒，但他所留下的罪惡，並未隨之以俱去。蔡元培曾為文謂袁世凱曰：

「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侈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跪拜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土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種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⑰

民國五年底，上海中西報紙，且盛傳袁世凱未死之說。陳獨秀則憤然曰袁氏未死，因為「吾耳日聞袁世凱之發言，吾目日見袁世凱之行事。」^⑲社會風氣如此，北京大學處於舊勢力籠罩之下，自然也受到了感染。如何將這種沉悶的局勢翻造過來，必需德望俱高的人士及無比的勇氣。蔡元培之毅然出長北大，顯然是想以此艱鉅自任，吾人今日檢討他在北大所推行的一連串重大而新穎的改革，於轉移風氣和啓迪民智上確實收到了很大的功效，所以黃季陸譽之謂：「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的首都革命。」^⑳茲將他在北大的重要改革措施，分項述之於下。

^⑯ 以上參考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一文，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355～358。

^⑰ 蔡元培：「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459～463。

^⑲ 陳獨秀：「袁世凱復活」，刊「新青年」二卷四號，民國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⑳ 黃季陸：「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係」，刊「傳記文學」五卷三期，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出版。

(1) 提高教員素質

民國五年底，蔡元培到了北京，首先訪問醫專校長湯爾和，詳詢北大近年實況。湯因推介主編「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仲甫）為文科學長。蔡在清末時即對陳有一種不忘的印象，今聞湯爾和言，又翻閱了「新青年」，便決意聘他。而原任理科學長夏元璞（浮筠），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⑤在延聘教員方面，蔡元培認為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有濃厚研究興趣的，這樣才可以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因此，到校之後，便聲應氣求，先後為各科請到了不少積學而熱心的教員。據蔡元培回憶說：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啓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甚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只有王亮疇、羅鈞任（文榦）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只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⑥

蔡元培對聘請教員的原則，是抱人才主義，只問學問、能力之有無，而不問其思想、派別、年齡、資格、和國籍為何。因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學校就很難成立。現就這幾項略作分析說明：

甲 不問思想派別

①就政黨言：帝制復辟派中有名震海外而持復辟論的辜鴻銘，拖着長辮子，在英文系教英國文學，但未講過一句復辟。而新帝制派的劉師培，是清議所指責為罪人者，在國文系教古代文學，也從不曾講過一聲帝制。此外，尚有籍

⑤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隸國民黨的王寵惠、無政府主義派的李石曾等，及以後變成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等。

②就史學言：信古派，有陳漢章等。疑古派，有錢玄同、胡適、沈尹默等。甲骨考古派，有王國維等。

③就文學言：文言派，有黃侃、陳介石、劉師培、林損等。改良派，有朱希祖等。白話派，有胡適、陳獨秀、周作人、周樹人、劉復（半農）等。

④就語言文字學言：舊派有章太炎的弟子黃侃（季剛）等。新派有錢玄同、劉復等。

⑤就經學言：今文學派有崔適等。古文學派有陳漢章等。

要之：新派以胡適、陳獨秀等為首，舊派以劉師培、黃侃等為首。將這些人聚攏在一起，誠非易事。

乙 不問年齡

據「北大廿周年紀念冊」所列教職員名錄的記載：徐寶璜二十五歲，梁漱溟二十六歲，朱家驛二十六歲，劉文典二十八歲，胡適二十八歲，辜鴻銘六十二歲。時蔡元培五十一歲，他對這些二十多歲的青年教員，也都一樣敬重。例如梁漱溟在民國六年應聘到北大講學時，據梁自己說，實際上只有二十四歲，與學生年齡相若，有的比他還大兩歲。蔡元培之所以聘他，是因為看了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究元決疑論」，認為他富於研究興趣，是個好學深思的人，故請他去開印度哲學。梁謙辭，謂對印度哲學所知有限。蔡仍堅請說：「你不是愛好哲學的嗎？我自己是愛好哲學的，我們還有一些愛好哲學的朋友。我這次辦大學就是要將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中的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研究來學習好了！」⁵²這是何等器局，何等識見！

丙 不問資格

民國元年，蔡元培曾拔擢過一位未進過大學門的青年王雲五，到教育部專門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長，第一科即大學科，負責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的起草。在他

⁵² 梁漱溟：「紀念蔡先生」，刊「文化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主持北大時，教授中從舊時代的進士，新時代的博士，到新舊任何資格都沒有的人，只要有學問，也都被同樣禮遇。

丁 不問國籍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說過一段故事：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闡珊瑚，也跟着闡珊瑚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位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位英國教員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了。』我也一笑置之。」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這種膽量的人，實不多見。他既非盲目的排外，也不盲目的崇洋。他始終認為學術文化的貢獻是大學應當着重的任務。因為時代的劇變，更覺得灌輸新知、融會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像上述這些隨便由使館裏私人關係請來的外籍教授，大都以此為傳教等項工作的副業，或一意敷衍，實不能達成這項任務。在他心目中所要聘請的，是外國各大學裏真有學問的大師。民國八年五月，北大請到了大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來講學一年多，實開西洋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的風氣。以後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⑤3}、杜里舒（Hahs Driesch）、泰戈爾（R. Tagore）均相繼而來。地質學家葛利普（Grabau）長期留在中國，尤其能領導中國地質學界不斷作有價值的科學貢獻。

由以上四項用人的標準來說，充分顯示出蔡元培的胸襟是多麼開闊！但同時，他對教員也有相當的約束：甲、本校專任教員，不得再兼他校教科；乙、本校教員擔任教科鐘點以二十小時為度；丙、教員中有為官吏者，不得為本校專任教員；丁、本校兼任教員，如在他校兼任教科者，須將擔任教科鐘點報告本校；戊、本校兼任教員，如在本校已有教科鐘點十二小時者，兼任他校教科鐘點，不得逾八小時以上；己、教員請假過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辭退。^{⑤4}以培養專業及敬業的精神。此顯然是受了德國教育方面的影響，才作如此規定。德國大學中的教授，教課與研究

^{⑤3} 羅素於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來華抵滬。

^{⑤4} 「蔡子民整頓大學之辦法」，見「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二號（民國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頁 11，記事。

是並重的，其教課的時間不多，並且不兼其他雜務，^{⑤5}以免影響研究工作。在這種情形下，才真能做到教學相長。

(2) 紛糾學生陋習與錯誤觀念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的腐敗是出了名的，茲引述當時兩個北大學生的話為證。顧頡剛說：

「那時的北大實在陳舊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學堂』的形式。教員和學生，校長和教員，都不生什麼關係。學生有錢的儘可天天逛妓院、打牌、聽戲，校中雖有舍監也從不加干涉。」^{⑤6}

羅家倫說：

「民國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裏，談到光顧的客人，則首稱『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與衆議院，一堂便是京師大學堂。」^{⑤7}

再者，當時社會上仍留有科舉時代的遺毒，認為上大學是謀個人入仕途的出身，出身則以法科為宜。由於視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所以入法科者特多，入文科者甚少，而入理科者尤少。因此，北大對願入文科的人，特別放寬入學考試的尺度，對報考法科的人，則規定必須有大學預科畢業的文憑。民國四年，馮友蘭拿着預科文憑去報考北大文科時，主持報考的人就很替他惋惜，勸他先報考法科，如果考取了，仍願入文科，可以請求轉科。因為從法科轉文科一定會准，從文科轉法科就相當困難。^{⑤8}一般人的觀念既然如此，也就難怪學生視學校為變相的科舉了。

北京大學之所以日趨腐敗，種因甚早，在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所收的學生，多為京官，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有當差。上課鈴打了，由當差來請「老爺上課」。充滿了官僚的習氣。他們平日對學問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期滿，便可得到一張文憑。上課之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和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教員也不知用功，年年發舊講義，在講壇上唸。到考試時，學生就要求教員告知出題的範圍，甚至所出的題目。教員為了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

^{⑤5} 同註④，頁126。

^{⑤6} 顧頡剛（以筆名「余毅」發表）：「悼蔡元培先生」，刊「責善」半月刊，一卷一期，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⑤7}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頁2。

^{⑤8} 馮友蘭：「北大懷舊記」，刊「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頁23。

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就告訴學生；於是學生不用功的習慣，便得到一種保障。

在光緒三十二年，蔡元培曾任過譯學館^{⑤9}的教員，所以對於學生的這些壞習慣，知道得很清楚。這些學生，他們的目的不僅在畢業，而尤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較為認真一點的，便被藉口反對。對於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表歡迎。因為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很有妨礙的。所以，蔡元培第一要改革的，便是學生這種錯誤的觀念。他於民國六年一月九日發表到校後第一次對學生的演說時，就開宗明義的說明：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進大學不當「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⑥0}必須抱定為求學而來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規。這種精闢、勇敢、誠摯而富於感動性的呼聲，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廓清了多年來深入人心的遺毒，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靈魂，也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啓示。

他又懼勉學生「砥礪德行」，因為「方今風俗日媿，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而「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責任重大，故「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礪人。」尤需「敬愛師友」。^{⑥1}他如此毫無保留揭穿當時北大腐敗的情形，具見其革新整頓之決心。

在敦品勵行方面，可舉一件小事為例。北大學生當時還有一種壞習慣，喜歡在牆壁上貼一些匿名揭帖攻擊自己不滿意的人，蔡元培在一次演說中痛斥此事，大意謂：在牆上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然有過，也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始。如對某人不滿，可以規勸；若以為不可規勸，儘可對學校當局說，不此之圖，而在牆壁上攻擊，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傅斯年當時也是寫匿名揭帖人之一，

⑤9 譯學館於光緒二十九年九月開館（其前身為同文館），是京師大學堂的附屬機關之一，是年底，脫離大學堂，改屬總理學務大臣，至宣統三年九月停辦，又併入大學堂，其址即為北大之第三院。詳見陶英惠：「京師譯學館校友錄的史料價值」，刊「新知雜誌」第四年第三期，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出版。

⑥0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 292~296。

⑥1 同註⑥0。

他聽了這一番話，便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而北大匿名壁報文學，也就此絕跡。⁶²

蔡元培洞悉北大學生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是走向腐敗、對學術沒有興會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對症下藥，除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高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外，並提倡課外的高尚娛樂，如組織進德會，有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條基本戒；及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游蕩的舊習。又助成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辯論會、靜坐會，使學生多作有益的課外活動；助成消費會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與平民講演團等，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這種做法，也是受了德國的影響。德國大學生的生活，非常自由，難免有違紀情事。他們補助的辦法是：校中社團非常發達，舉凡同鄉會、體操會、競舟會、音樂會以及以研究學問、藝術等為目的之組織，應有盡有，凡是學生，大率必隸屬於某社團，即受該社團規約之束縛。而學生的社團成立時，必須先定規則，連同幹部及會員名冊送校長核定，有害學校風紀之團體，自不會獲准設立。⁶³因此，學生們可以藉其所參加的社團來互相砥礪，不致過分墮落。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校政期間，校中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其中除小部份為教員發起、主持、或指導外，大部份為學生所組織。茲根據手頭現有資料，將北大各種社團彙成下表（見次頁），⁶⁴以資醒目。由各社團成立的宗旨及其主要活動，不難看出這時的北大，確已呈現出蓬勃的朝氣：

除此之外，蔡元培更在校中倡辦各種刊物，以提高學術研究的興趣。在他接長北大以前，校中除了規程以外，很少有出版品之刊布，全校師生，沒有聯絡感情和

⁶²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中央日報」。

⁶³ 同註⁶⁴，頁130。

⁶⁴ 本表參考北大二十、三十周年紀念冊、蔡元培全集等編成，挂漏在所難免。有些學會，北大的教員學生雖為主要分子，但也有校外人士參加，如民國十年元月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其創始之十二人中，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孫伏園、郭紹虞、沈雁冰是北大畢業生，其後加入之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顧頽剛、周樹人（魯迅）、易君左等，也多為北大教授。）及民國七年七月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如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館主任，許德珩、康白情、易君左、雷國能、徐彥之、蘇甲榮等為北大學生）等，則暫不列入。

名稱	成立年月	發起人	宗旨	負責人	主要活動	備考
進德會	七年一月	蔡元培	建立新道德觀念			淵自民元的進德會及社會改良會
哲學會	六年三月	陳鐘凡 黃建中 馮友蘭 孫本文 等十餘人	商榷東西諸家哲學淪啟新知	幹事：陳鐘凡	每月開演講會一次，每年刊行會刊二～四冊	
理科化學演講會	六年十二月	潘之耿 李冰等	集合同學練習文化演講方法，而收觀摩之益		每星期舉行演講常會一次	
雄辯會 (分國語及外國語兩部)	六年十一月	雷國能 毛準(子水)等	修繕辭令，發展思想	會長：雷國能	每兩週舉行常會一次，每學期舉行比賽大會一次	由預科之文學會改組而成
音樂會 (分西樂國樂二部)	六年春	周文燦等十餘人	研究音樂，陶冶性情	會長：夏宗淮	每週舉行常會一次，編印音樂雜誌	由五年秋北大音樂團更名而成
書法研究社	六年十二月	羅常培等	昌明書法，陶養性情	執事：薛祥綏 楊湜生	每週任寫各體書呈教員評定	
畫法研究會 (分本國畫外國畫二部)	七年二月	蔡元培	研究畫法，互相觀摩	幹事：狄福鼎(膺) 陳邦濟	每月開會一～二次	初羅常培發起圖畫會，狄福鼎發起書畫會，本合二者為一，迨畫法研究會成立，善書者入書社，善畫者入畫會。
體育會	六年十二月	夏宗淮等十人	練習各種運動技術，強健身體	會長：楊濟華	每年開常會一次	
靜坐會	七年二月	計照	修養身心	幹事：計照	講習靜坐，以三月為一期	
技擊會	六年十月		強壯身體，研究我國固有之尚武學術	名譽會長：蔡元培 會長：徐械	每日課餘練習	由預科體育會拳術部演變而來

閱書報社	不詳（在七年四月之前）	徐章垿 (志摩) 等	聚集同志購閱書報	幹事： 毛以亨 吳澄		
學生儲蓄銀行	七年三月	徐寶璜	獎勵學生儲蓄，並練習銀行業務	總經理： 葉淵		
消費公社	七年三月	李宏增 六十餘人	出售教職員學生日常消費物品	董事： 李宏增 等七人		由胡鈞（千之）教授指導
成美學會	七年三月	胡適 鄭陽和	捐集基金以津貼可以成才而無力求學之學生	暫由發起人經理		
哲學研究會	八年一月	陳大齊 馬敘倫 胡適等	研究東西諸家哲學、論啓新知	幹事	講演、編輯、調查	
哲學研究會	十四年二月	陳大齊 胡適 徐炳昶 等二十八人	研究哲學	常務幹事二人	研討：討論會每月一次公開演講每年八次；出版發行不定期刊物、翻譯西洋哲學名著重印中國哲學名著。	
教育研究會	十一年	楊廉 盧遠曾 等	研究教育學理及實際問題		分庶事、研究、調查三部	至十五年改稱北大教育學會
行知社	十二年十二月	梁漱溟 楊世清等	注重實際生活	書記一人	每月集會一次	
新聞研究會	七年春	徐寶璜	介紹歐美新聞學本吾國新聞界之經驗以印證學理	主任： 徐寶璜	編印新聞週刊	
社會主義研究會	七年十月	陳獨秀 李大釗				十年十二月改名馬克斯學說研究會
學術講演會	六年十二月	蔡元培	傳布科學引起研究興趣	幹事長一人	每週請人講演一次	該會為北京各校教職員及各界名流之聯合組織，暫附設北大。

交換意見的地方，不免有所隔膜。學生有事和學校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了貼在布告欄中，儼然是一座衙門。蔡元培就任之初，即公布：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這種謙虛作風，頗使一般學生摸不着頭腦。⁶⁵

歷年與北大有關的刊物，可分為三種：一、學校刊物；二、教授私人組織的刊物；三、學生私人組織的刊物。

學校刊物最先創辦的是「北京大學日刊」，民國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以徐寶璜為編輯主任，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孫國璋為編輯，除星期一外，日出一張。⁶⁶除了發表校中消息，報告學校現狀於全國教育界外，又收登師生的論文及討論駁難的文字，無形中增高了學術研究的空氣。學生對學校有所建議，也送登「日刊」，學校當局擇其可行者立即督促有關部門實行。學生與學校間的意見得以溝通，便不再有若何隔膜。

但「日刊」的篇幅有限，不能刊載長篇學說，到了民國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蔡元培又創辦「北京大學月刊」。他在「月刊」發刊詞中解釋發行「月刊」的目的有三：一、盡吾校同人力所能盡之責任；二、破學生專已守殘之陋見；三、釋校外學者之懷疑。⁶⁷「月刊」發起之初，定由九個研究所各任一期之編輯，因組織不統一，故徵稿頗多困難，繼以各研究所之歸併與改組，常常衍期。至十一年春，乃決計廢止「月刊」，改為四個季刊：一、國學季刊；二、自然科學季刊；三、社會科學季刊，四、文學季刊。⁶⁸其中「國學季刊」於十二年一月出版，「社會科學季刊」於十一年十一月出版，都是學術性的刊物。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提出：(1)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2)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研究的資料，(3)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以後國內的國學研究能有成績，這篇文章所提示的正確方向與具體方法，實為主要因素。「社會科學季刊」為顧孟餘所編，內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倫理、史地等欄。又有「歌謠週刊」一種，為研究歌謠與方言的專家園地，其中搜集各地民歌、方言及研究論文頗多。編輯人有常惠（維

⁶⁵ 同註⁶⁴。

⁶⁶ 「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沿革一覽，頁32；一覽表，頁6。

⁶⁷ 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226～230。

⁶⁸ 「北京大學月刊特別啓事」，刊「東方雜誌」十九卷六號，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鈞)、顧頡剛、魏建功、董作賓等。第一期於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至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九十七期停刊。後曾一度復刊。

教授私人組織的刊物，則有「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週報」及「讀書雜誌」等。其中以傳佈新思想的「新青年」所發生的影響最大。「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乃陳獨秀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所創辦，至五年九月一日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民國六年，陳獨秀被聘為北大文科學長，七年一月，北大教授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復、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後加入編輯部，與陳獨秀輪流主編。內容偏重學術，不談政治，提倡白話文，擁護民主與科學，反對孔教、國粹及舊文學。八年六月十一日，陳獨秀因散發傳單在北京被捕，拘留八十餘日，獲釋後即辭卸北大教職赴上海，「新青年」亦旋移上海出版，開始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而與北大諸人脫離了關係。

當「新青年」改組時，由於胡適等主張不宜討論實際政治，而陳獨秀與李大釗則認為談論政治的條件已經成熟，陳、李乃另創「每周評論」，於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行。在「五四」前後，「每周評論」對時局常有詳細的報導與批評，頗具鼓盪作用。及陳獨秀被捕，李大釗遠走故鄉，改由胡適主編，至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停刊。

民國十一年，胡適與丁文江倡議約集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組織一小團體，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乃於五月七日創刊「努力週報」，號召「好人政治」，為對北京政府當頭一棒。「努力」共出七十五期，於民國十二年十月停刊。

「讀書雜誌」(月刊)是「努力週報」的增刊，每月第一週出版，第一期於民國十一年九月出版。「努力」停辦後，「讀書雜誌」仍繼續出版，至十四年十月停刊。

此外，如周作人等所創辦的「語絲週刊」(以周作人的小品文及周樹人的雜文為代表，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王世杰、陳源(西滢)、周覽等所辦的「現代評論」(為討論時事的刊物，態度較溫和，十三年十二月創刊)、徐旭生、李宗侗等所辦的「猛進週刊」(十四年二月創刊，批評時事，態度頗激烈)等，也都是

繼之而起的重要刊物，但在創刊時，蔡元培已經離校了。

教授們的學術論文或研究著作，多在各著名刊物發表，或印行專書，成為一時的風氣，國內學術的水準遂因之而提高。

至學生私人所組織之刊物，則以「新潮」月刊為代表。「新潮」於八年元旦正式出版，以表現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及革新的文詞為最高原則。其主幹人物多為習文史者，計有：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毛子水、俞平伯、孫伏園、葉紹鈞、楊振聲、馮友蘭、朱自清、張松年等。這些學生，在五四愛國運動時，多半是領導人物，在以後的教育、學術、文化、及政界方面，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⑥9}

北大師生的刊物，在民國八、九年創刊的尚有：「國民月刊」、「國故雜誌」、「新生活週刊」、「奮鬥旬刊」及「家庭研究」等，^{⑦0}彼此爭奇鬥艷，各抒所見。凡此皆為蔡元培提高學術研究興趣的結果，也是北大師生坐言起行、努力扭轉學風的事實表現。

(3) 培養自由研究學風

蔡元培認為大學是囊括大典，包羅衆家之學府。所以他主持北大時，對於各家學說，是依照各國大學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由前述他聘請教授標準及所請到之教授來看，的確已經做到了這一步。因為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真理愈辯愈明，只有使各種不同的主張並存，才能使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不致抱專己守殘之陋見。他指陳我國過去學生的毛病為：

⑥9 以上參李書華：「碣廬集」（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出版），頁73—77。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年元月出版），第一冊，「蔡元培無所不容有所不為」（頁13—50）、「蔣夢麟振興北大復興農村」（頁51—111）、「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頁113—213）、「傅斯年學行並茂」（頁215—236）、第三冊「陳獨秀悔誤晚矣」（頁85—96）等篇。

⑦0 係自「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1959年出版）及「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北京，1961年出版）兩書中查得。恐怕尚有遺漏，如民國十年二月，京畿衛戍司令部查得北大校內刊發「先驅」半月刊一種，咨呈國務院查禁，據北大回復稱：「查本校各種印刷物並無『先驅』之名，且該刊編者係屬匿名，亦不知何人所辦。」即為一例。見陰法魯：「北洋軍閥對進步刊物的摧殘」一文，收在「五四運動文輯」（湖北，1957年出版），頁98。

「以學校爲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爲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科學一部，尤爲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爲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①

要革除這種弊病，開拓學生的眼界，惟有培養自由研究的學風，使各種學說自由發展。例如在文學方面，胡適、錢玄同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劉師培、黃侃等，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而陳介石、陳漢章一派的文學，與沈尹默一派的也不相同，蔡元培就讓他們分庭抗禮，各行其是。

他所以具有這樣的襟懷與識見，除了先天的稟賦以外，當然與他豐富的閱歷有關。他所接觸的人物，所聞見之事故，所觀摩之學術，流派類別極其繁雜，因之思想才不受時地之限，而能融會貫通。他青年時期曾從事考據之學，於理學有深厚的造詣，是從中國傳統的博學風氣裏面陶鎔出來的一個人，對學問的興趣非常廣泛；中年以後，復留學歐洲，在著名的大學及研究所致力於精深之研討，而所從學之人，又皆宏深博大之輩，故對其治學治事有極大的影響。^② 學術自由是爲歐洲學者所歷來擁護的，蔡元培雖然和他們一樣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但不主張，而且反對。例如馬克思的思想，他以為在大學裏是可以研究的；可是研究的目的決不是爲共產黨作宣傳，而是爲學生解惑去蠱；因爲有好奇心而無辨別力，是青年被誘惑誤入歧途的根源。他曾特別解釋這一點說：

「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致不敢言馬克思，此誤會也。吾人研究中國共產黨所由來，或不能不追溯馬克思；而研究馬克思，不必即與中國共產黨生關係。且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不必即信仰馬克思。」^③

① 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② 顧孟餘：「憶蔡子民先生」，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報」。

③ 蔡元培：「李季著『馬克思傳』序」，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由於他這種休休有容的態度，的確使北大，特別是文科所在地的漢花園，氣象爲之一新，同時也成爲守舊人士非議的目標。蔡元培爲釋羣疑，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予以闡解：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派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爲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爲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爲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爲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藉以資心理學、論理學之印證，而初無與於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爲怪。今有月刊以宣佈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儘管蔡元培這樣辯解，仍舊無法平息外界的攻擊，因爲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持成見，加譏嘲辭。民國八年三月，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令教育總長傅增湘致函蔡元培，對「新潮」雜誌的批評態度，頗有微詞，原函云：

「自『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近頃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辯難，因辯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範圍之外，將益啓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爲隱憂耳。……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恒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討論糾紛，喜爲抨擊。設有悠悠之辭波及全體，尤爲演進新機之累。甚冀執事與在校諸君一揚榷之，則學生之幸也。」

蔡元培復信說：

「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之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

張，無所缺崎。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據『新潮』編輯諸生言，辦此雜誌之初心，原以介紹西洋近代有益之學說為本，批評僅屬末節。……『新潮』持論，或有易致駭怪之處，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將事，以副盛情。……大學兼容並包之旨，實為國學發展之資。」^④

蔡元培這種支持反對舊勢力的青年的態度，以及在北大採取「兼容並包」的用心，自不能為外界諒解。在同月十八日，林紓（琴南）則在北京「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嚴詞指責北大，其要點為：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

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今仍存者。……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

……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慾，於己無恩，……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勝辯，置之可也。……」

最後又說：「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同日，蔡元培即覆一長函，說明辦理北大方針及對新文化運動之主張，針對林氏所提諸點，一一據實

④ 傅增湘致蔡元培原信及蔡元培復信底稿，均存北京大學。此處引自陰法魯：「北洋軍閥對進步刊物的摧殘」一文，頁95。

加以駁斥。對於「覆孔孟」，蔡元培的答覆是：

「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至大學教員在校外自由發表意見，自與學校無涉；即偶有對於孔子學說有批評之「新青年」雜誌，亦惟對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至於「剷倫常」之說，尤與事實不符，蔡說北大：

「近來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寧有剷之之理歟？」

對於林紓謂北大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一點，他也據實指出其不確：

「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科，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即使教員所編講義爲文言，上講壇後，仍須賴用白話講演，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再者，白話與文言，只是形式不同，內容仍是一樣的。引車賣漿者固有能操流利之語者，然其言並無若何價值。北大善作白話文者，如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都是博極羣書，並非不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的。最後更申述其在北大的兩種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對於教員，以學諧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②

② 兩函均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這是兩篇爲文化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的文字。林紓的論點頗爲錯亂，蔡元培的答覆，則義正辭嚴，剖分事理，至爲明白，使林紓啞口無言。事實上，不能「以守常爲是」的不是蔡元培，而是林紓自己，他本着所謂衛道的熱忱，在八年的二三月間，曾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過兩篇小說，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夢」，^⑯兩篇的意思很相同，都是影射和誹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人，不過一望之俠士，一托之鬼神而已；他希望有一種外力來制裁，來壓伏新思潮的含義，却是兩篇一致的精神。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很多，時常有人散布政治勢力將干涉北大的消息，北大處在北洋軍閥勢力圈中，顯已成爲衆矢之的，然蔡元培與惡勢力奮鬥的決心，並未稍減，有人向他建議：解除陳獨秀聘約，並約制胡適言論，以保全北京大學。蔡元培爲了維護學術自由，毅然表示：

「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爲學術，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⑰

(4) 革新學校行政組織

我國新教育興辦之後，學制多規仿日本，至蔡元培接長北大時，已發現弊病，故就任伊始，即於民國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所舉行的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中，提出大學改制之議案，商請改革。至學校內部之行政組織，亦逐步着手革新。茲分數項說明如下：

(甲) 改革預科

光緒二十八年京師大學堂重開時，因爲驟辦大學，各省府州縣學堂尚未遍設，一時尚無具有入學資格的學生，特定一權宜辦法，先設預備科，以爲過渡。宣統元年三月，學部奏請改預備科爲高等學堂。民國元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鑒於各省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於是，以前從權添設的大學預科，至此反成爲學校系統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由於各省高等學堂的停辦，而分設大學案又沒有實現，乃造成各省高等教育青黃不接。

^⑯ 「荆生」收入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第一集「建設理論集」，頁174—175；「妖夢」收入同書之第二集「文學論爭集」，頁431—433。

^⑰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中央日報」。

的局面。⁷⁸

蔡元培到北大後，又發現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及預科學長的誤會，產生不少弊端：⁷⁹ 第一、預科一部二部之編制及年限，並未盡善。舉一部為例，既兼為文、法、商三科預備，於是文科所必須預備，而為法、商科所不必設者，或法、商科所必須預備，而為文科所不必設者，不得不一切課之。這樣一來，多費學生之時間及心力於非要之課，則重要之課反為所妨。第二、預科既不直隸各科，乃演成獨立狀態，甚至自設「預科大學」名義；其一切課程，並不求與本科銜接，而與本科競勝；取本科第一年應授之課，於預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學生入本科後，以第一年之課程為無聊，不僅減少其對於學問上之興趣，而且浪費一年寶貴光陰，實屬可惜。⁸⁰ 同時預科又因受了教會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均形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針對此弊，蔡元培從兩方面進行改革：一方面解散獨立組織，決定於六年暑假後廢止現設預科及預科學長，使分隸各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預科中的主要功課，亦由本科教員兼任；另一方面改訂大學修業年限，本科及預科原來均為三年，蔡元培初擬將大學均分為三級，預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二年，凡六年。當提至教育部所召開的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討論時，則多以預科一年之期為太短，又以研究科之名為不必設，決定大學均分為二級，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合六年課程，通盤計劃，不使重複。教育部乃於六年三月十四日指令各校照此決議案辦理。⁸¹ 九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公布修正之大學令中，正式規定：「大學本科之修業年限四年，預科二年。」（第八條）「大學預科須附設於大學，不得獨立。」（第十六條）直到民國十八年，才將預科制完全廢止，一面提高中學的程度，一面延長大學的年限，來彌補取消預科的缺憾。⁸²

⁷⁸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頁96, 104。

⁷⁹ 民國二年夏，北大預科由西齋北部移至譯學館舊址，內設二部，稱一類二類，一類即文科，復分英、法、德三系；二類即理科，均三年畢業，俱有文官考試資格。學生初時僅二百餘人，至六年夏竟達九百餘人。（見徐崇欽：「八年回想」）

⁸⁰ 「北京大學啟事」，刊「新青年」三卷六號，民國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⁸¹ 蔡元培：「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573～579），「我在北京大學的經驗」。民國六年十一月，北大廢預科學長，以文、理、法、工預科事務分歸各本科學長管理。（見「國立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大事年表」）

⁸² 同註⁷⁸。

(乙) 「學」與「術」分校

蔡元培認為大學的文理兩科，專研學理，是「學」，農工醫法商等科，重在應用，是「術」；但「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⑧而學習者的旨趣亦不同，故應以「學」為基本，以「術」為支幹，而又不可不求其相應。可是當時除北大外，其他公私立大學，多為法商等科，很少兼及文理兩科，主要的原因是升官發財的思想太濃厚，遂致重「術」而輕「學」。所以蔡元培提議「學」與「術」分校。他以為一個完全的大學，應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如果沒有並設的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以農工醫法商等科為分科大學，所謂分科，就是可以獨立為農科大學、醫科大學等，不是像文理科必須並設，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大學研究以「學」為範圍，而分科大學則以「術」為範圍，一在培養學者，一在培養專門職業人才，兩者性質雖然有別，但不必有年限和程度之差。這比他在民國元年修改學制時，主張「設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農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設理科」之見解又進一層。在提請校務會議討論時，獲得通過，教育部於民國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布之修正大學令中，也承認這種制度，但未用本科分科之名，規定大學但設一科者，得稱某科大學，修業年限，則仍為本科四年，預科二年。

(丙) 避免科系與他校重複

蔡元培既認識文理兩科為農工醫法商等應用科學之基礎，而北大校舍與經費，亦實難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不如集中精力辦文理法三科，以免與他校科系重複。同時，他一向注重學術界的互助與合作，而極端反對妬忌與排擠；認為學術的研究，要有集體的合作；就是校與校之間，也應當互相合作，一個學校不必包攬一切。他於「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說：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尅

^⑧ 蔡元培：「在愛丁堡中國學生會及學術研究會歡迎會演說詞」，原刊民國十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三一號，見中華書局編「蔡元培選集」頁184—187。

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併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北大與北洋大學，一在北京，一在天津，相去甚近，實無重複設置科系之必要，故將北大之工科併入北洋，北洋之法科，併入北大。[◎]其好處是在學術上分工合作，各有專長，可免雷同。再者，當時學校尤其是大學的設置，不甚普遍，蔡元培又主張各大學的設立，在空間上也不要集中，可使各地方的人，都同樣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丁) 溝通文理兩科

蔡元培一方面雖力主「學」與「術」分校，文理與法商工農醫隔離；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反對專己守殘之習，力主文理互修，兼涉他科，俾互相糾正，以免過失。他在「口述傳略」中說：

「予民又發見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為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為根底。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

他認為：「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一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提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由北大試辦，把文、理、法三科界限撤去，分為十四系（後增為十八系），廢學長（即今之院長），設

◎ 「教育大辭書」頁259「北洋大學」條，謂北大工科於民國六年歸併該校，其法科則移併北大。又見「國立大學近訊」，刊「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九號（民國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頁65—66，記事。

系主任。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學實行「通才教育」頗多相似。

(戊) 各學系的歸納聯絡

民國八年初，蔡元培又在北大實行大學本科組織的新計畫，廢止文、法、理等科名目，改用學系制，分大學本科為五組十七系：

第一組：數學、物理學、天文學三系；

第二組：化學、地質學、生物學三系；

第三組：心理學、哲學、教育學三系；

第四組：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四系。

第五組：經濟學、史學、政治學、法律學四系。

第一、二組為甲部；第三、四、五組為乙部。甲部偏重數學、物理等；乙部偏重歷史、地理等。一屬於理，一屬於文。預科二年畢業，就甲乙兩部中習一部的共同科學，畢業升入本部，本部第一年仍習共同科，至第三年，乃習分組，選修科四年畢業。其各系之組，蓋就文理二科所列之科目，而益以其他之基礎科學，並融通文理兩科界限，目的在使學者能夠得到完全明確之精深學術。[◎]此專為培養學者起見。在關於實用方面，則另立分科大學。除以上各科外，並增美術一門，專授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科，亦得為分科大學之一。

至民國十二年，又把上述五組合併為三組：即第一組與第二組合併，第三組與第五組合併，第四組增設俄文學系，共有十八系，惟小部份學系，如教育、心理、生物、天文、俄文等，尚附在他系之中，未能獨立。

這個研究學術的新計劃，有兩個特色：第一是使本系之外還有「組」（系際）的聯絡，本組之外還有「部」的關係。第二是應分應合，均頗適當。[◎]

(己) 廢「年級制」，採「選科制」

蔡元培在政治上信仰民主、自由，所以對於大學學制，也贊成選科制，而反對年級制。民國六年十月，教育部召集在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北大即提出

[◎] 靜觀：「國立北京大學之內容」，刊「東方雜誌」十六卷三號，民國八年三月出版。

[◎] 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頁107—108。

大學廢去年級制，採用選科制議案，⁸⁷ 當經與會諸代表通過。蔡元培事後追述此項改制的理由及趨勢說：

「蓋世界爲有機的組織，有特長者不可強屬之以普通；世界有進化的原則，有天才者尤當利用之以爲先導。此後新教育，必將漸改年級制，而爲選科制。又如美國普通學校之大組織，與二重學年制，亦漸近選科制，而可以採用者也。」⁸⁸

「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複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適教員中有自美國留學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遂提議改年級制爲單位制，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由北京大學試辦。」⁸⁹

自民國八年起，北大即正式仿美國大學辦法，改採學系制和選科制。不但辦學者可以根據社會需要以及人力和財力來增減學系和學科，就是學生也可以就自己性之所近來選擇學系和學科。但所謂選科，是「學生只有相對的選擇，無絕對的選擇，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學，才有選擇權。」⁹⁰ 到了民國十一年，政府正式承認大學校應用選科制。這也是我國大學教育上一個很大的進步。⁹¹

(5) 創辦各科研究所

清末的學制，在大學之上設一通儒院，爲大學畢業生繼續研究之所。蔡元培在民元教育總長任內的大學令中，改通儒院爲大學院，於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爲教授的研究機關；並彷彿德國大學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才能畢業。但各大學並未實行。大學中有正式的研究所，係始於民國七年的北大；⁹² 有獨立而相當完備的研究所，則始於十六年的中央研究院。兩者皆爲

⁸⁷ 「北京大學着手修改學制」，刊「教育雜誌」第九卷，第十二號（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頁89—90，記事。

⁸⁸ 蔡元培：「歐戰後之教育問題」，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247～255。

⁸⁹ 「口述傳略」。

⁹⁰ 蔡元培：「對於師範生的希望」（在湖南第六次講演），原刊民國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一五號，見中華書局編「蔡元培選集」頁176—178。

⁹¹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頁104—105。

⁹² 何基鴻：「國立北京大學沿革述略」。

蔡元培所開創與主持。民國七年初，北大擬設之研究所有九個：(1)國文學，(2)英文學，(3)哲學，(以上文科)(4)數學、(5)物理學，(6)化學，(以上理科)(7)法律學，(8)政治學，(9)經濟學。(以上法科)各研究所之任務規定如下：(1)研究學術，(2)研究教授法，(3)特別問題研究，(4)中國舊學鉤沈，(5)審定譯名，(6)介紹新書，(7)徵集通訊研究員，(8)發行雜誌，(9)懸賞徵文。研究所之主任教員，均為知名之士：

文科 哲學：胡適；中國哲學，胡適；心理學，陳大齊；論理學，章士釗。國文：沈尹默；古文，黃侃；文字學，錢玄同；國語，錢玄同。英文：黃振聲；文學，辜鴻銘。

理科 數學：秦汾；物理：張大椿；化學：俞同奎。

法科 法律：黃右昌；憲法，王寵惠；政治：張耀曾；經濟：馬寅初。^⑧

這是北大初設研究所的計劃與情形。自民國九年起改組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外國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而其中的國學研究所先於十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以沈兼士為主任。所內分設編輯室、考古研究室、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明清檔案整理會、方言調查會等。^⑨ 後來各大學亦相繼有研究所之設立，如清華國學研究院、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等。當時北大國學研究所有幾個特點：第一，所招取的研究生，只問學力，而不問資格。非大學畢業不得投考研究所的規定，是以後的事。第二、實行導師制，自由研究，不必按時上課。第三、報名填寫研究項目，呈送著作，經委員會審查合格者得領「研究證」到所研究，如不能常川到所研究，得以通信研究行之。期限由研究生自定，可以隨時延長，無所謂畢業，亦不給文憑。

(6) 實行男女同校

關於男女同校問題，在民國五六年間，教育界已視為重要問題之一，曾引起討論，其主張大約分為急進與緩進兩派。急進者認為：我國是個貧國，在大都市中，或可於男校之外，另立女校，但在偏僻縣市，就無力於男校之外另立女校，假若男女必須分校，則大多數女子受教育的機會便無形被剝削了。所以主張自國民學校至大學，皆宜男女學生並收，使受教育之機會平等。緩進派則認為：男女學生同校，

^⑧ 「北京大學研究所之內容」，刊「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民國七年三月出版。

^⑨ 「國立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大事年表」。

只應限於大專及小學，因為小學生年齡尚幼，男女兩性區別未明；至高等教育時期，則學生已有相當之修養，惟在中等教育，則適屆青春時期，生理之變化至劇，道義之觀念未明，男女生斷不能使之同校。

北大對此項問題，也表示重視，因為北京已有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本科學生不久即將畢業，畢業後，必有一部分志願再求深造之學生，屆時一定提出考升大學之要求，所以不能不預為籌計。蔡元培素來是主張男女平等的，民國九年二月，他為廣育人才計，首先在北大招收兩名女生為旁聽生。因為在此兩年，已有少數女學生直接致書蔡元培，詳論男女同校之理由，並述個人願入之志趣，蔡元培極表同意。教員方面，也多數贊成，而女生也有陸續請求男女同校之舉，因此決定暫行試辦。此為我國高等教育學校男女同校之嚆矢。^⑤

蔡元培於「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敍述其經過云：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他又於「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中說：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於教育部。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其實學制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准其就學，請從北大始。於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那麼一個重大的久經醞釀而未能實現的問題，就這樣輕易解決了。男女同校在今日已不足為奇，但當時我國社會對男女之防範綦嚴，實行此制，是需要相當勇氣的。

(7) 組織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

蔡元培一向醉心合議制，不願大權獨攬。他在民元教育總長任內，已有近於「教授治校」的規定；如大學令第十六條至十九條，明定全校的評議會和各科的教授

^⑤ 「北大收納女生之由來」，見「教育雜誌」十二卷三號，民國九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會的設置。及長北大，便把從前的規定完全付諸實行。先設評議會，爲商決校政之最高機關。^⑨ 次成立各科教授會、教務會議、行政會議、總務處等。他於五四運動後回任北大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講時說：

「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學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爲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恢復學長的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合議制，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究各種事務。」

民國八年，廢各科學長，設教務長一人，由各系主任公推一人擔任。當時北洋軍閥當政，政治不上軌道，爲政者往往不能久於其任，蔡元培深恐爲了校長一人的更迭，而牽動學校校務，妨礙學生學業，故決定實行合議制。照他的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作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意在防止軍閥干涉校政。即使一年換一個校長，也不受影響。在他長北大期間，由於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日少，離校之日多，而離校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仍能依照計畫進行者，不能不歸功於這種制度。

五 改革效果的剖視

民國成立後，北伐成功前的十餘年間，北方一直是在北洋軍閥勢力籠罩之下，而爲國民革命的勢力所不能及，帝制及復辟運動，此伏彼起，兵連禍結，迄無寧日。蔡元培入長北大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行將結束，而人類一種新機運初步展開。在此新舊勢力相搏之際，他以教育家的地位，企圖以教育文化的革新，來達成武力革命所不易達成的任務。在北大經營的結果，不僅使北大面目一新，成爲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更重要的是影響所至，使整個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起了顯著的變化，一切的傳統思想，均遭到了嚴重的衝擊，分別予

^⑨ 北大評議會成立於民國六年，各系教授會於民國七年次第成立。「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頁六，謂民國四年十一月設評議會，誤。

以重行估價。這可由下述的幾件事情得到證明。

(I) 對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新文學運動又被稱為白話文或國語文學運動，是一種有意識的文學解放運動，來改良表現情感與思想的工具，也就是要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鎖，以現代人的話，來傳達現代人的思想，表現現代人的感情。這是文字和文學的解放，也從而引起了思想上的解放。^⑦

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蔡元培在上海辦報時，即曾主張作白話文，但那時的白話文，「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⑧ 民國六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改良文學須從八事入手，可以說是這次文學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書。同年二月，陳獨秀接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為胡適聲援，揭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由於陳、胡二人相繼到北大任教，所以北大便成了新文學運動的大本營，這大本營的最高領導者就是蔡元培。他以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而「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更舉出東西洋與中國的史實證明由文言到白話是共同的趨勢，斷定白話派一定佔優勢，所以對新文學大力贊助。由於聲應氣求，同事的教授們如錢玄同、沈尹默、劉復（半農）、李大釗、周作人、周樹人（魯迅）等，也和他們互相呼應，互相討論；而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起而和之。他們所主辦的刊物，除了上述的「新青年」之外，他如「每週評論」、「新潮」、「努力週報」等，也都是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起初，他們也曾遭到強烈的反對，可是，他們的言論和主張，也隨着反對者們的突起而更為進步，更為堅定。及至「五四」愛國運動發生，新文學更是得到長足的發展。^⑨ 結果，教育部於民國九年三月，即通告國民學

⑦ 羅家倫：「五四的真精神」。

⑧ 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見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建設理論集」。

⑨ 鄭振鐸在為其編選的「文學論爭集」所撰的「導言」中，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有扼要的評述。他認為

校文體教科書，分期作廢，逐漸改用語體文。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各雜誌的作者，僅限於少數學者，但由於這一思想工具的改變，知識普及了，原來是文言的雜誌，也大都改變成了白話，任何人都可以寫文章發表。於是全國各地產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各種新文藝、新思潮的刊物，紛紛應運而生。據當時的統計，民國八、九年之間，全國各地的白話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種之多。^⑩因此，不僅擴大了讀者羣，也擴大了雜誌的影響力和文化運動的成果。

(2) 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至於新文化運動，簡單的說，就是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分門別類的按照現代生存的需要來重新估定其價值。若是國粹，自然應當保留；若是國糟，便應當揚棄。^⑪何者為國粹，何者為國糟，要用科學的態度，現代的眼光，也就是合理的標準去區別。凡是不合理的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都要加以批評，於是嚴重的觸怒了衛道的先生們。凡是一種新運動的興起，舊社會的人們總是不易接受的。於是他們視北大為「洪水猛獸」，更運動軍閥以暴力來壓迫、來摧殘。蔡元培於是發表了一篇光芒萬丈的短文：「洪水與猛獸」。^⑫他「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現在軍閥和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得餓死；——這不是率獸

第一期是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在此期中，一方面對舊的文化，傳統的道德，反抗，破壞，否認，打倒；一方面樹立起言文合一的大旗，要求以國語文為文學的正宗。就文學上說，這初期運動者所要求的祇是「文學」的形式上的改革。第二個時期（「五四」以後），也就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時代，是新文學的建設時代；在這時所討論的不完全是攻擊舊的，乃是更進一層的如何建設新文學，或新文學向那裏去的問題。及至五卅慘案發生，又轉入另一時期，即從文學革命而產生了革命文學。見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集「文學論爭集」頁1~22。鄭學稼所著的「從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香港，亞洲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三版）一書，對以後左派作者霸佔文壇而助長赤禍的情形，有很詳細的敘述。

^⑩ 胡適：「『五四』的第二十八週年」，見「胡適選集——歷史」（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出版）頁127。另據第一屆世界報紙大會紀錄所載，民國十年我國的定期刊物是：週刊一四五種，旬刊四六種，雙週刊五種，半月刊四五種，月刊三〇三種，季刊四種，半年刊一種，年刊一種，共七十三種。見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出版）上冊，頁318。

^⑪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頁60。

^⑫ 「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食人的樣子麼？」因此，他主張不可壅塞新思想的洪水，却要先驅逐軍閥的猛獸。他絲毫不隱諱自己是站在「洪水」一邊，來對抗「猛獸」的。

當時攻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最力的刊物，大家都知道是「新青年」；但事實上，「新青年」這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工作，乃是以保衛共和政治為主眼，則往往為一般讀者所忽略。^⑩關於此點，陳獨秀曾說過一段辯護的話：

「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滌乾淨不可。因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是重在平等精神，一個是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時代的舊思想，那是萬萬不成。」^⑪

陳獨秀提倡民主，主要是維護民國，維護共和，反對帝制復辟和軍閥；他提倡科學，主要是反對當時祭天、孔教、看相算命。胡適對這個說法還有商榷，他積極提出的是「整理國故」、「介紹思潮」。這都無打倒傳統之意。^⑫

新文化運動是從新文學運動範圍的擴大而產生的，當時北大新文學運動中的健將，也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堅份子。他們為近代中國做了下斬荆披棘的工作，開闢了一條思想的大路。所以，有人以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啟明運動，等於歐洲十八世紀的啟明運動（Enlightenment Movement），也有人說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與啟明運動合而為一的運動。羅家倫說：「就人本主義和對於古代文化重行評價一方面來說，則新文化運動頗似文藝復興運動。就披荆斬棘，掃除思想和制度上的障礙，及其在政治社會上的影響來說，則頗似啟明運動。」^⑬

(3) 與五四愛國運動的關係^⑭

光緒二十八年，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曾有過一幕轟轟烈烈的抗俄運動，然後要求

^⑩ 周弘然：「『新青年』雜誌關於文化問題之主張」，刊「中華雜誌」第二卷，第五期，頁31—36，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⑪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

^⑫ 胡秋原：「五四運動及中國近代史研究綱要」（三），刊「中華雜誌」第二卷，第七期，頁46，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⑬ 羅家倫：「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見所著「文化教育與青年」（臺北，民國41年重印本）頁55。

^⑭ 胡適認為羅家倫用「毅」的筆名於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刊行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上發表「五

清廷資送出國留學，是為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在翌年的「奏定學堂章程」中，遂對學生的行為，定有種種禁令，嚴密防止學生運動的發生。[◎]直至民國八年，才有大規模的五四愛國運動出現。胡適說過：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五四愛國運動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至於它的發生，追根溯源，不能不歸功於蔡元培在思想界所投下革命的石子。

在民國七八年之間，北京政府由安福系執政，他們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在強隣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安如泰山。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蔡元培最初在北大的種種改革措施，尚不至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衝突。但等到他們將注意力投射到政治的改善問題時，大的風潮便不可避免了。

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北大及各專門學校學生二千餘人往總統府請願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要求宣布條文。當北大學生出發時，蔡元培曾力加勸阻，學生不聽，乃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因為他素有一種見解，以為學生在校應以求學為最

四運動的精神」一文，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最早的創始者。事實上，北京學生聯合會於五月十八日所發表的罷課宣言巧電中，即已用「五四運動」一詞了。（見蔡曉舟、楊景工〔為「楊量工」之誤，即今考試院長楊亮功之化名〕合編之「五四」一書，民國八年七月出版，現收入「近代史資料」雙月刊，1955年第二期，頁39～90。）其含義係指民國八年五月，北京學生為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了，於是集合了幾千人示威遊行，要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青年愛國運動。國內的記載在提及「五四運動」時，多半是指此意。近年來有些學者（特別是國外的學者），則稱此為「五四事件」（The May Fourth Incident），而其所稱之「五四運動」是廣義的，包括此前之新文化運動等。（周策縱在其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一書之導言中，有詳細的討論。）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多係曾參與此事者的記載，為免名詞混淆，對「五四運動」一詞之含義，仍沿用前者，以便與「新文化運動」等詞有所區別。

[◎]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

[◎] 「奏定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湖北學務處刊本），第五冊，各學堂管理通則，學堂禁令章第九，規定學生：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及本學堂事務，不准離經畔道，妄發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布報章，不准聚衆要求，藉端挾制，停課罷學等事，不准聯盟糾衆，立會演說，甚至連報館主筆也不得充任。

[◎] 「胡適文存」（亞東版）二集，卷3，頁11。

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府團體，不必牽涉學校。^⑪事實上，這時北大的基礎尚不甚穩固，他不便出面對學生此舉作強有力的支持，以免引起當局的注意，而使革新之功毀於一旦，破壞了他對北大的希望。但是到了這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當歐戰終了的消息傳來時，蔡元培便不再保持沉默了，他和北大的年青教授們，對於國內的政治和國際的現狀，都不滿意，都渴望起一種變化，都渴望有一個推動現況的機會，他們將歐戰的結束，認作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演說會中，^⑫蔡元培所講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在這篇演詞裏，他說：「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第三是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第四是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在結語中他說：

「世界大勢，已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個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這是一篇很明顯的向當日黑暗政治勢力的公開宣戰詞。胡適說：「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着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⑬

在上面這篇演詞中，蔡元培滿懷樂觀，他期望美國威爾遜總統十四原則及公理戰勝強權的實現，一般青年學生也懷着同樣的期望。不意八年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完全被現實政治的妥協主義打消了！強權主義終於勝利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東半島的要求居然到手了！原來的樂觀頓形幻滅。這個打擊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熱血沸騰，於是赤手空拳的做出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

^⑪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⑫ 自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舉行大會三天。

^⑬ 胡適：「紀念『五四』」，收在「五四愛國運動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頁22—30。

蔡元培既憤於國際的無公理，而對北京政府的無能，尤表厭惡。因此，他對五月四日的青年愛國運動，不但表示贊同，而且竭力支持。在當天晚上，北大學生齊集法科大禮堂會商營救被捕學生時，蔡元培出席致詞，即謂「今日所發生的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⑩幾經交涉，被捕學生終在五月七日獲得釋放。

「五四」最初的重心雖在北大，但迅即瀰漫到全國，他們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動機非常純潔。但在親日派方面，則以此事全由北大所主持，必係出於蔡元培之嗾使。既集矢於北京大學，更遷怒於蔡元培個人，更加上政客的推波助瀾，想乘機奪取此一教育機關。而少數以衛道自命的人士，亦欲去蔡以打擊新文化運動。一時風聲鶴唳，蔡元培不得不於五月九日留書辭職出京。他在出京途中致函北大學生云：

「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僕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僕之去職為有不滿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忽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⑪

自蔡元培出京後，北京各大學又行罷課，而全國其他各地學生也紛起聲援，風潮益形擴大。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職務，始稍緩和。在六月二十八日，各國簽訂對德和約時，我國代表因五四運動的爆發，國內外的堅決反對，遂不出席簽字，直到十年底，召開華盛頓會議，十一年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交還中國，這是全國各界在「五四」所共同力爭的結果。

蔡元培在各方挽勸下，不願再為個人的去留問題而牽動學校，遂同意回任。在這次運動中，他認為學生的確表現出有自治的能力和自動的精神，目的既已達到，便應該轉移心力於學術研究上，作救國的長遠打算，不要再浪費寶貴的光陰去罷課、遊行、示威。他說：「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

^⑩ 「五四愛國運動紀要」，同上書，頁5。

^⑪ 「蔡元培先生全集」，頁1108—1109。

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⑩

(4) 與國民革命運動的關係

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三者的性質雖不盡相同，但精神却是一貫的。新思想可以激起政治的變動，政治變動，也可以釀成新思想。新思想藉新文學而傳播，新文學運動又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也是推動他的主流。「五四」一部份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則因「五四」而波濤洶湧，瀰漫全國。彼此互有關聯，而且都與蔡元培以及他在北大推行革新的措施，有着莫大的關係。

蔡元培是一個革命者，愛國者，從這方面他給予青年們一種打破當時政治現狀的感召；他又是一個強烈的知識追求者，從這方面他做了青年們向思想文化方面努力的一個引路人。^⑪ 蔡元培認為在「五四」之後，全國學生界空氣為之一變，有四點可喜的新現象、新覺悟：(1)一變前此荒嬉暴棄的習慣，自己尊重自己；(2)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3)對自己學問能力有了切實的了解，一改從前滯鈍昏沈的習慣，變為隨時留心，遇事注意的習慣；(4)深知有計畫的運動，才能成功。^⑫ 他還說學生有兩種最可寶貴的覺悟：「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功用；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盡力於平民教育。」^⑬ 這是他在「五四」之後，對整個的情形所作的持平之論。但他也不諱言，由於社會上重視學生，也生出許多流弊，主要是學生以自己為萬能，常常想去干涉社會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他認為：

「不求學專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極大的危險。國家的事不是學生可以解決的，學生運動不過要提醒外界的人，不是能直接解決各種問題。所以用不着常常運動。」^⑭

⑩ 蔡元培：「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341。

⑪ 左舜生：「五四運動與蔡子民」，見所著「中國現代名人軼事」（香港，自由出版社，民國四十年九月出版）頁44。

⑫ 蔡元培：「對於學生的希望」（在湖南第七次講演），原載民國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一六號，見中華書局編「蔡元培選集」，頁179—183。

⑬ 蔡元培：「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原載民國十一年五月四日「晨報」，見同上書，頁195—196。

⑭ 蔡元培：「對於師範生的希望」（在湖南第六次講演），原載民國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一五號，見同上書，頁176—178。

可是，在以後的若干年，罷課、遊行、示威之風，越來越盛，學潮層出不窮，許多人便歸罪於「五四」。其實，這是由於野心家和中共的利用學潮，才使原來單純的青年運動變質的。因此，也生出了許多誤解，以為「五四」與共黨有關。中共也利用一般人的誤會，冒充「五四」繼承者，定該日為「青年節」。其實，中共的成立，是在「五四」以後兩年又兩個月，他如何來領導「五四」？

於此，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當蔡元培在北方大力提倡新文學、新文化而釀成五四愛國運動時，領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也把握潮流趨勢，命戴季陶等集合同志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八年六月六日創刊），完全用白話文刊行，俾與北大幾個有力量的刊物如「新潮」、「每週評論」等相呼應。又命胡漢民等在滬創辦「建設」雜誌（八年八月一日創刊），從精神上、物質上研討建設國家之具體問題，並提供方案。又命廖仲愷等將英文原著「實業計劃」譯成中文，在「建設」雜誌中分期發表，以期喚醒民衆。^⑩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南一北的兩大運動，是在殊途同歸！也可以為民國五年冬中山先生為何贊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一事，找到真正的答案。

至中山先生對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重視，可由他於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致海外同志書」中看出：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界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⑪

^⑩ 參羅家倫：「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頁52—54。

^⑪ 「國父全集」，第三冊，頁玖——453。

信中所說，最可以表示當時一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對於「五四」的前因後果的公允評價。中山先生是位革命領袖，所以他最能了解這個「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在革命事業上的重要性。在蔡元培赴歐旅行時，中山先生曾寫信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除對北大的各種運動大加獎譽外，最後並勉勵他「率領三千子弟，參加革命。」[◎]當民國七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專心撰述「實業計畫」時，蔣夢麟曾任他的助理，參加搜集資料及校閱原稿的工作。由孫與蔡、蔣個人間以及黨魁與黨員的關係，亦不難看出北大與國民革命運動合流的情形。

六 辭職及其原因分析

五四運動以後，北京的教育界有兩種主張：甲派的主張是：要想維持教育，必先澄清政治。因為教育和政治是分不開的。教育不良，固然不能產出好政治；可是政治不良，也同時不能維持好教育。乙派的主張是：要想維持教育，必先使教育界與政治脫離關係。[◎]儘管蔡元培在十一年三月所發表的「教育獨立議」一文中，主張教育應該獨立，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似乎是取乙派的態度；但他一貫的作風，毫無疑問是屬於甲派的。當初他所以毅然出長北大，就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到北洋軍閥和舊勢力的巢穴中去做一番革新的工作。在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以蔡元培領銜，與王寵惠、胡適等十六人所聯名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他們希望國中的優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為「好人」的人們出來過問政治，「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他們深信：「做好人是不夠的，須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有決戰的輿論。」在該文中，充分顯示出他們欲澄清政治的決心。但以無拳無勇的文人來說，要想澄清政治，除了用言論來制裁外，便只有不合作一途。

當民國七年底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蔡元培在北京和平期成會（時任副會長）中，聽到某代表說：對抗惡政府的最好方法是「不合作」，不替他們辦財政，辦外

[◎]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社，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再版），頁94。

[◎] 涵：「北京教育界的歧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努力週報」，第六十一期。

[◎] 刊民國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努力週報」，第二期，該文為胡適起草。

交，和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否則，便是助紂爲虐，罪加一等。便深受感動，默記在心。民國八年春，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園開會，通過對政治問題的意見。若是政府置之不理時，該怎麼辦呢？蔡元培說：「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⑯又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爲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⑰在「五四」之後，他即表現其久已具有的個人奉身而退之決心，作爲對北京政府使用「不合作主義」的首次嚴正表示。

民國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文鈞，忽以金佛郎案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提議，再度監禁。蔡元培對彭氏此舉，認爲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應有嚴正表示。乃於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一面呈請辭職，一面離京，以去就爲抗議。在其給黎元洪總統的呈文中說：

「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不呈現於中國。國人十年以來最有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⑱

胡適讀了他這篇悲憤的抗議以後，便在「努力週報」中撰文指出這一舉措之重大意義：

「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北京的教育界，連年疲精力於經費問題；在多數國人的眼裡，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錢』『飯碗』等字結了不解之緣了。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⑲

一月二十三日，蔡元培又有一篇很明白痛切的宣言，北京「晨報」給他加上了一個

^⑯ 「蔡元培自述」，頁83—86。

^⑰ 胡適：「蔡元培以辭職爲抗議」，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努力週報」，第三十八期。

^⑱ 同註^⑯。

^⑲ 同註^⑰。

很確當的標題，叫做「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認為「蔡氏欲以不合作主義打破今日之惡人政治」。在這篇宣言中，蔡元培首先指出易經裡的一句話：「小人知進不知退」。他又引申說：

「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⑩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的一去，明明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假如他的抗議能引起一般人已經麻木了的政治感覺，那就是積極的勢力了。他又解釋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是因為北京的政治一天一天的墮落：

「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空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⑪

在這篇沉痛的文字裏，他一方面控訴「不要人格，止要權利」的當局壞人，一方面控訴「有奶便是娘」的無數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他的去志已決。胡適主張不要挽留，因為他知道蔡元培是挽留不住的了。

蔡元培辭職出京後，一月二十五日，國立北京高師、醫專、美專、工專四校長也呈請辭職，而北京國立八校學生聯合會亦展開了如火如荼的「驅彭」運動。其時，蔡元培寄居蘇州，而要求他回校的代表還是絡繹不絕。他為了表示決心，乃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在其離校期間，校務由蔣夢麟代理。十五年春天，蔡元培由歐洲返國，因為京津間適有戰爭，未能回校，即留在南方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是年七月八日，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名義。時北大師生仍一再挽留，並派譚熙鴻及鍾觀光二人為代表前往敦勸，又匯去旅費五百元，請即啟程北來，但蔡元培去志已決，將旅費如數璧還，始終不肯北返。^⑫

^⑩ 同註^⑨。

^⑪ 同註^⑨。

^⑫ 北大師生挽留蔡元培事，見民國十五年七月三日至八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十六年六月，張作霖稱大元帥於北京，以劉哲爲教育總長。八月，劉哲併國立九校爲京師大學校，自兼校長。十七年六月，國民政府統一告成，初改京師大學校爲國立中華大學，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兼任校長，派李煜瀛代理校務；繼因實行大學區制，又改中華大學爲國立北平大學，包括前國立九校及天津北洋大學。北大學生欲保留北大歷史上之特性，對此舉堅決反對，爲謀復校，形成嚴重學潮。嗣經蔡元培與吳敬恒之調解，議定北京大學改爲北平大學北大學院，以陳大齊爲院長。十八年八月，大學區制取消，北大方恢復原來名稱。九月十六日，蔡元培復受命爲北大校長，此時他正主持中央研究院，未能到任，於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辭職，其間校務全由陳大齊代理，至十二月四日乃正式任命蔣夢麟爲北大校長。綜計蔡元培「居北大校長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

七 結 論

京師大學堂成立時，風氣初開，衆喙索繖，謗讟交集，王湘綺詩至有「誰料求才空費財」之句，可見輿論之一斑。興學之初，由於主持者目光短淺，不免失於重實用而輕學理，故效果不彰。

新教育爲新社會、新政治之一部分，在政治未上軌道以前，新教育很難作單方面之發展。當戊戌變法失敗時，蔡元培即認定其所以失敗，乃由於不先培養人材，故即返里從事教育工作。民國五年底，他自法返國毅然出長北大，即爲貫澈其培養人材之素志。

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以前，全國的出版界，幾乎沒有什麼談得上研究二字的，不是膚淺的政論，就是學校教本，或者很淺近的參考用書。及至民國八、九年間，北大的幾種刊物一出，若干種的書籍，一經印行，全國的風氣，乃爲之改觀。從此以後，研究學術的人，不但不再爲一般人譏評，反受到了相當的尊敬。

蔡元培在北大所實行的種種改革，如：分大學爲二級，預科二年，本科四年；使「學」與「術」分校；廢年級制，採選科制；創辦各科研究所；組織評議會；以及實行男女同校等，起初雖僅限於北大，但多爲教育部採行作爲改革高等教育的依據。

在他主持北大校政期間，以一個革命黨員的身份，置身於北洋軍閥統治下的文化教育界中，不但不向惡勢力低頭，反主張用新思想的洪水，驅逐軍閥的猛獸。這在轉移風氣和啓迪民智方面，的確發揮了重大的功效。當時的北京大學，到處惹人注目，譽之者稱為文化前驅，新思想之重鎮；毀之者謂為反叛的巢窟，過激的淵藪。^⑬ 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這是必然的現象，不足為怪。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吾人回顧這段史實，當能客觀的給予適當評價。最重要的一點是：辛亥革命後，滿清雖被推翻，但政權仍為守舊而腐敗的惡勢力所把持，一般人對之仍心存畏懼；但經過了這番奮鬥，軍閥惡勢力的假面具被戳穿了，反抗惡勢力的勇氣相對的增長了，也從而奠定下以後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

茲借用左舜生的幾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假如我們說，到了蔡先生，中國才開始有了像樣子的大學出現，這決不是過譽。」^⑭

^⑬ 君宇：「北京大學過激化了嗎？」，刊「嚮導週報」第七期，頁55，192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⑭ 左舜生：「中國現代名人軼事」，頁43。